

古希腊城邦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

郝呈新

古代希腊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欧洲人民的宝贵遗产。在漫长的奴隶制时代,地处古希腊核心地带的雅典,这个据神话传说由智慧女神雅典娜保护的奴隶制城邦,曾经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被誉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典型。这种政治体制自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萌芽,至公元前五世纪末被摧毁,历时近两个世纪。它的出现,为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希腊地区奴隶制经济的繁荣。本文试对这一政治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概述。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前身——贵族政治

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是传说中的第十代王提秀斯改革时建立的。根据历史记载,提秀斯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建立中央议事会管理各部落的重大事务;二是把公民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参政、掌权。由于产生了公共权力机构,形成了氏族社会所不能承认的等级制度,确定了贵族参政的政权组成原则,说明氏族制度已被摧毁,雅典国家初步形成,贵族政治建立。

但是,雅典国家初期的行政机构仍然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残余,氏族贵族掌握重大的政治权力,这我们从其国家常设机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国家首领是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公元前683年又改为一年一任;人数也逐渐由一人增至三人、九人;执政官从贵族中选举产生,卸任后进入贵族会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贵族会议:负责监督官员、控制行政、维护法律,拥有很大的权力。国家的第三个常设机构是公民大会:由自备武装的平民军人组成,负责选举贵族官员;其成员无担任官职资格;大会的权限极小。由于平民与贵族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导致了矛盾的尖锐激化,平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抗贵族的斗争,贵族政治产生了危机。

二、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基础

平民的斗争主要是因为贵族的专制统治和高利贷剥削使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占有奴隶制盛行,小农破产,一些平民沦为债务奴隶,公民减少,兵源危急,社会动荡。工商业奴隶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债务奴隶制扩大的冲击,也加入到推翻贵族政治的斗争行列中来。

公元前594年,出身没落贵族的政治家梭伦(约公元前640—560年)被推选为

执政官,开始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向贵族政治开了刀。其主要内容为:首先颁布了“解负令”,取消平民所欠一切公私债务,恢复债奴自由,禁止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这就推倒了压在平民头上的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其次,按财产多少把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雇工级”四级,规定前两个等级可担任执政官,第三等级只能任普通官职,第四等级不能当官,可参加公民大会及陪审法庭。这就取消了氏族贵族的门第特权,提高了工商业奴隶主和一些平民的地位。再次,建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四个部落各出100名代表组成四百人会议,前三级公民皆可推为代表。会议为公民大会作准备,提出议案,贯彻决议,实际上取代了原来的贵族会议。陪审法庭属司法机关,负责监督执行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各等级公民皆可当陪审员。另外,梭伦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还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改革措施,如限制粮食出口,发展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统一度量衡;奖励外邦手工业者移居雅典,提倡每个雅典人至少掌握一种手工业技术等。

总之,梭伦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从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调整了公民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它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创立了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的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为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奠定了基础。

三、僭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迈进

梭伦改革没有实现农民分配土地的要

求,没有肃清氏族制的残余。结果,贵族怨恨,平民亦不满意。梭伦被迫离职出国游历达十年之久,晚年潜心研究著书。后人尊称他为雅典古代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古希腊的“贤人”。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在下层平民的支持下当上了雅典的“僭主”,开始了“僭主政治时期”(前560—510年)。古希腊的“僭主政治”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后建立的非贵族政治统治,是公元前7—6世纪希腊城邦形成时期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产生的政权形式。庇西特拉图执政期间,继续推行梭伦立法,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的政策,如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将土地税降为收获量的5%(另一说为10%);大力扩充商船队和海军,改善水陆交通,推进工商业发展等。尽管他的统治还很不稳定,但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发展了社会经济,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实力,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雅典在深化民主改革的大道上继续迈进。

四、克里斯梯尼改革标志民主政治确立

公元前510年,僭主政治结束。翌年,克里斯梯尼被推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这位平民领袖、著名政治家当政后立即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第一,他把雅典划分为十个地区部落和一百个村社。这就取消了原来按照血缘关系划分的四个部落,彻底摧毁了氏族制残余。使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享有公民权,民主力量迅速扩大。第二,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会议职能同前。成员由每个地区出50名代表组成,会后以地区为单位,组成主席团,轮流执政,一年一轮。五百人会议既是

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也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第三,建立十将军委员会,实行贝壳放逐法。每个地区由公民大会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轮流统率军队,一人为首席将军。贝壳放逐法规定公民大会可秘密投票表决放逐危害国家民主与安全的分子,公民在贝壳或陶片上写上人名,某人被投六千票以上,即判刑流放国外十年。这就在军事上和群众监察方面为国家民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从而使国家的统治机构趋于健全和完备。

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自梭伦开始的体制的改革,虽然历经艰险和磨难,梭伦本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经过一个多世纪不懈的努力,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氏族制度的残余被铲除,民主政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后确立。克里斯梯尼不遗余力地扩充民主势力,加强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创造性地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成群众性的监察机制以维护民主制度,在雅典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此以后,跨入文明门槛的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而是奴隶与奴隶主间的矛盾,正象恩格斯所说,“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于了。”^①

五、民主政治的繁荣期——“伯里克利时代”

雅典由贵族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的原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强大推动,雅典政治家卓有成效的改革以外,还因为雅典的工商业发达,工商业奴隶主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坚决反对贵族的特权,在斗争中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民主政治拥有强大的重要的

社会基础。

就在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后不久,希腊各邦的东方邻国一波斯帝国发动了侵略性的希波战争。希腊人民自公元前500年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抗战,终于击败了强大的入侵之敌。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稳步发展,走向繁荣,达到了极盛时期。

希波战争以后,雅典的商业贸易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有所扩大,工商业奴隶主的势力又有增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发展,第三、四等级的自由民力量上升,特别是第四等级在希波战争中组成海军人员的90%,成功地进行了萨拉米斯海湾战役,扭转了濒于失败的战局,对国家乃至整个希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这种功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民主政治有了更广泛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公元前443年,著名民主派代表人物伯里克利(前495—429年)出任雅典十将军委员会首席将军,并连任了十五年,把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开创了“伯里克利时代”(前443—429年)。

伯里克利在高度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有重大突破。他宣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二十岁以上男性公民皆可参加,每月召开三至四次会议,讨论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国家大计。五百人会议是最高行政机关,执行公民大会决议,处理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为最高司法、监察机关,由六千人(每区六百人)组成,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当选,负责审理案件,监督公职人员。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十将军委员会,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一任,可连选连任,这一规定使十将军委员会的权力日益增强(执政官权力缩小),首席将军逐渐成为总揽军事、行政大权的国家最高官员。另外,

为使更多的公民能够参政,国家还实行了公职津贴制。

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力,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如鱼得水,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雅典奴隶制大发展,奴隶人数近20万,几乎占到总人口的1/2,奴隶被广泛应用到手工业及其他生产领域,较大的作坊使用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奴隶。雅典成为希腊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门类繁多,据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记载就有木匠、青铜匠、石匠、雕刻工、塑像工、金工、象牙刻工、纺织工、绣工、画师、制绳匠、麻纺工、桶匠等数十种,而每一行业分工也很精细,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产品享有盛名。雅典一时成为地中海上的贸易中心,庇里犹斯港成为著名的国际商港,与欧洲、黑海、小亚细亚西部、地中海、北非等地建立了更加广泛的商业联系。作为希腊半岛上最发达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坚强堡垒,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荟萃到雅典,再加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使这颗欧洲文化艺术殿堂上的明珠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辉。

六、雅典民主政治的阶级实质

雅典的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时开始产生,到克里斯梯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虽经希波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而不衰。但最终却毁于公元前404年结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各城邦之间争夺霸权的内战。这就应验了“堡垒最容易从

内部攻破”的名言。

民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有它的阶级属性,它不是广义上的民主,更不是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这是由它的阶级局限决定的。据哈蒙德《希腊史》的估计,公元前431年,雅典的全部人口约40万人,其中奴隶约20万人,自由民16万8千人,其余为外邦人。按照法律规定,奴隶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这样,23万多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在16万8千自由民中,还要排除全体妇女,有公民权并能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剩下了仅约4万人。这4万有资格的公民是否都去参政呢?也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事农业、手工业、航运业的生产者或小商人,每隔十天左右就前往雅典开一次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是人口的极少数,只能是富有的工商业大奴隶主。虽然一般公民都有资格当选国家公职人员,但由于没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力量作保障,仅靠少量的公职津贴是难以支撑的。最重要的官职,如十将军,举手选举,没有薪俸,一般公民难以当选,即便侥幸当选也无力担任。所以,真正掌握实权的只有那些大奴隶主等极少数上层公民。这些执政者施放廉价的有限的民主权力,笼络广大公民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对内镇压奴隶,对外侵略扩张,争夺希腊霸权。因而,从根本上讲,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大奴隶主的政治统治,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注】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责任编辑 丁新约)